

·文献学苑·

从《汉书·艺文志》探索汉代典籍整理的特点

陈莉 (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藏部 广东广州 510275)

摘要:《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综合性图书目录,它记载了从先秦至西汉的大量典籍,分类明确,评述简要,为后人了解西汉以前典籍概况、先秦学术思想源流和演变,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文章以该书为中心探讨汉代典籍整理特点。

关键词: 汉书·艺文志 典籍整理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09)03-0129-05

The Collation of the Historical Books and Records in Han Dynasty Seen from *Hanshu Yiwenzhi*

Chen Li (Department of ancient classics, Library of Sun Ye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Abstract: *Hanshu Yiwenzhi*,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book catalogues ever existed up to now in China, records a large number of book lists from Pre-Qin to the Western Han period, with clear classifications and brief comments upon them.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discourse of *Hanshu Yiwenzhi*, tries to find 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llation of the historical books and records during that period.

Key words: Han Dynasty; Ancient books collation; characteristics; *Hanshu Yiwenzhi*

CLC number: G256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09)03-0129-05

《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是班固所撰《汉书》的一部分,删《七略》而成。因《七略》早佚,《汉志》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综合性图书目录。《汉志》的编撰,可谓有目的、有思想、有创新,所以历代学者对其在目录学、学术史、文化发展史等各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多有评述。本文试图藉《汉志》探索汉代典籍整理的特点。

“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因此汉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到了汉成帝时期,又“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1]“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2]这些搜求天下遗书的政策和做法极大地保存了典籍。搜求而来的大量典籍迫切需要整理,因此汉政府多次组织人员进行典籍整理,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刘氏父子的校书活动,“(汉成帝)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

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3]《汉志》正是班固在其整理成果的基础上增删而成。遍览《汉志》,从中可以管窥汉代典籍整理的诸多方面,如典籍的著作方式、分类、著录等等,从而可以探索汉代典籍整理特有的模式。

1 从《汉志》书目的著录管窥汉代典籍的著作方式

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4]其目的是推行儒学独尊的统治思想。其把儒学作为选官的标准,为世人打开了仕禄之门,使得儒家学说风行一时,出现了“传业者寔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5]的局面,儒经的研治可谓繁盛致极。《汉志·六艺略》类分九种,几乎每一类的小序中都涉及到时人对儒经的传承情况,如易类小序曰:“《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迄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6]。儒学研治的繁盛,随之产生了许多不同的著作方式,马宗霍归纳为“传、注、章句”三种为通行

的著述体例^[7]杨权归纳为“传、说、记、注、故、例、章句七体”。^[8]现仅就《汉志·六艺略》所体现的“传”、“说”、“记”、“故”、“微”、“章句”等著作方式来谈谈其特点。

西汉时期把解释经义的著述一般称作“传”。它是最早解释古书的著作方式，一般侧重于对经文思想内容的阐发，说明其微言大义。有学者总结“传”体的内容“或传述事实，证发文意；或传述师说，解释原文；或引经证事，借事明经。”^[9]《汉志·六艺略》春秋类对于“传”亦有详细的解释：“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10]《汉志》载“传”体著作颇多，如《齐后氏传》、《齐孙氏传》、《韩内传》、《韩外传》、《公羊传》、《公羊外传》等。

“传”还有“内传”、“外传”、“大传”、“小传”、“补传”、“集传”之别，虽名称不同，解经方式的侧重点不同，但其宗旨一致，都重在解经。

与“传”同时产生的著作方式还有“记”，“记，疏也”，^[11]“疏，通也”^[12]故“记”相当于“疏”，可以说“记”就是对经文进行疏理的一种著作方式。一般是先疏经文，再疏注文。如《汉志》载《乐记》二十三篇，《公羊颜氏记》十一篇等。

“说”，“说释也，从言兑一，曰谈说。”^[13]故“说”就是分析解释的意思，旨在以己意解说经义文理，其体例是先列出经文，再逐一加以解说。如《墨子闲诂·经说》：“知，知也者，以其知过^①物，而能貌之，若见。毕云：此释《经上》‘知，接也。’”^[14]《汉志》载《易》“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15]《尚书》有《欧阳说义》二篇，《诗》有《韩说》四十一卷等，书中以“说”为名者颇多，说明汉代学者多以此体解经。

《汉志·六艺略》所著书目中有以“微”命名的典籍，“微”是古代一种注疏用语，是阐明、分析或探究经的微言大义的意思。古人注书也多以“微”来命名，如《汉志》

中的“春秋类”有《左氏微》二篇，《铎氏微》三篇，《张氏微》十篇等。自汉以后，“微”这种著作方法得到发挥，从而产生发微、阐微、探微、指微、显微、明微、穷微、精微、微言等等多种名称，都是用来注释阐发深奥难懂的经文，使其浅显易懂。

“章句”即分章析句，逐句逐章串讲文章大意。沈钦韩曾曰：“章句者，经师指括其文，敷畅其义，以相教授。”^[16]可以说“章句”是经师对学生讲授经文而产生的一种体裁。《汉志·六艺略》有易类《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书类《欧阳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春秋类《公羊章句》三十八篇，《穀梁章句》三十八篇等。以这种方式产生的典籍在《汉志》著录中总是靠后，说明这种串讲经文大意的作法在当时是被人所不屑，如《后汉书·桓谭传》载：“桓谭……遍习五经，皆训诂大义，不为章句。”^[17]

此外，还有“故”、“故训”、“解故”等著作方式。“故”与“诂”通，皆是以今言解释、疏通古代语言或方言字义的一种注释方式。

汉代解经产生多样化的著作方式，它们之间时而有别，时而又等同，时而又并存。如《诗》有《毛诗故训传》三十卷，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曰：“诂训，第就经文所言者而诠释之，传由并经文所未言者而引伸之，此诂训与传之别也。”^[18]王国维亦曰：“故训者，大毛公所作，而传则小毛公所增益也。汉初《诗》家故与传皆并行”^[19]此谓传与诂训是不同的著作方式。但《春秋公羊传》载：“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何休注曰：“读谓经，传谓诂训”^[20]则“传”与“训诂”在这里又是等同的。汉代解经，有时为了需要，对同部经书的解说中会采取多种著作方式，如《汉志》载的《毛诗故训传》，对此马瑞辰解释曰：“毛公传诗多古文，其释诗实兼诂、训、传三体，故名其书为诂训传。”^[21]

这些因解经之随文释义而产生的著作方式，虽然名目众多，但实质都是一样，即皆着眼于经籍，对于经籍中的字、词、句以及经义等进行解说，以达到使人明字义、句意、全篇大意之目的。这也是上述著作方式所具有的共同特点。

汉代解经的繁盛，产生了诸多的解经释义的著作方式，对后世整理历史文献起到了阶梯的作用，为训诂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从汉至清，有些著作方式已被新

① 过 疑当为遇。

的名词所代替,如传、记、说都衍生成注或注疏,故、解故、训传、训纂、章句也统称为注释等等。

2 从《汉志》管窥汉代典籍的分类标准

《易·系辞》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22]可见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对事物进行分类的认识了。这种分类的认识发展到汉代,已逐步开始应用到典籍整理上。

汉成帝“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23]说明当时已出现按职守的不同分别进行归整典籍。《汉志·诸子略》著录诸子类为九流十家,对于每一家学派的源出皆归于官守,提出“诸子出于王官说”,如“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等^[24]这些都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因职守之不同来归整典籍现象,从而无形中进行了类分典籍。

刘歆正式开始类分典籍,打破以往因官守来归整典籍的做法,按典籍内容或特征等实际情况来类分典籍,但是其类分典籍的标准却不统一,《六艺略》分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及小学类;《诸子略》分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及小说家等九流十家;《诗赋略》分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杂赋及歌诗;《兵书略》分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数术略》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方技略》分医经、经方、房中和神仙。观其分类,正如姚名达评介其分类思想时所说:“诸子略以思想系统分,六艺略以古书对象分,诗赋略以体裁分,兵书略以作用分,数术略以职业分,方技略则兼采体纯粹之学术分类法。”^[25]《七略》的分类并不是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进行类分,而是按每类的具体情况来进行归类。

《汉志》沿承《七略》,保留了《七略》的典籍分类方法,故其分类标准亦是不统一的。

3 从《汉志》著录管窥汉代书目著录的特点

《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将古籍编目著录项目分为八大项,其中包括书名与责任说明项、版本类型项、书籍形态项、丛书项、附注与提要项。《汉志》中书目著录仅侧重于其中的“书名与责任说明项、附注与提要项”两大项,再细分其书目的著录,则主要体现在书名项、责

任者、附注项以及著录模式等方面。

3.1 书名项的著录

书名是一部书的代表,也是反映一部书籍内容起点,因此在著录典籍时,首先要准确著录其题名,也就是书名。然而在《汉志》中,对于书名项的著录并不统一,综合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以作者全名或姓氏为书名者。如:《李克》七篇;《陆贾》二十三篇等,《汉志》中多有仅以姓氏为书名的现象,如:《杨氏》二篇,《韩氏》二篇等,近三十多条书目。

二、仅以姓氏和“子”尊称相连为书名者。如《晏子》八篇;《曾子》十八篇等,“诸子略”类多是这种情况。

三、以文体形式为书名者。这个主要是体现在“诗赋略”,如《屈原赋》二十五篇;《淮南歌诗》四篇等。

四、以著作方式为书名者。前面已讨论过当时所产生的多种著作方式,《汉志》中“六艺略”多出现这种书名,如:易类《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礼类《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等。

五、以官爵为书名者。如:《太史公》百三十篇;《魏文侯》六篇等。

3.2 责任者项的著录

著名目录学家余嘉锡在《古书通例》一书中,提出“古书不题撰人”,且以《汉志》书名中的人名多以姓氏代称为例来说明他这一观点。^[26]现从《汉志》书目中对于责任者的著录来看,当时人们著作时确实并不注重其责任者。

在《汉志》中对于责任者的著录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直接著录责任者,如:《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凡将》一篇,司马相如作等,像这种直接标明著者的情况,在《汉志》643条^①书目中只有11条,仅占0.01%,不到1%。

二、在书名前直接标明责任者,如刘向《五行传记》十一卷;许商《五行传记》一篇;扬雄《苍颉训纂》一篇等,亦仅有14条,占0.2%,亦不到1%。

三、不著录责任者,但在附注项中说明责任者情况,如:《雅琴师氏》八篇,名中,东海人,传言师旷后;《世子》二十一篇,名硕,陈人也,七十子之弟子等等,约占0.13%。

四、不著录责任者,仅在书名中体现责任者,如:

①据傅荣贤《〈汉书·艺文志〉见著文献数量统计》文中统计,文中百分比皆以此总数量为基准。《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4(3)。

《齐孙氏传》二十八卷；《李克》七篇；《贾谊》五十八篇；《宋玉赋》十六篇等等，约占60%。

五、完全不著录责任者，如：《齐说》二十九篇；《弟子职》一篇；《地典》六篇等等，约占34%。

前二种明确标明责任者的情况是微乎其微的，而书目中不著录责任者的情况却占很大比重，特别是数术略和方技略，全部书目完全都不著录责任者。这些都说明秦汉时期人们并不注重反映典籍的责任者。

3.3 典籍篇幅计量单位的著录

关于典籍篇幅计量单位的著录，是由其特殊的时代决定的。在纸张发明之前，典籍具有多种载体形式，如竹简、木牍、帛书等等，因而对于典籍篇幅的计量单位有多种形式，如“篇”、“卷”等，这些计量单位在《汉志》中多有体现，如：《韩氏》二篇；《邹氏传》十一卷；《孝经》一篇，十八章，长孙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等。

纵观《汉志》著录，其《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前四略是“篇”、“卷”并重，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数术略》和《方技略》这二略一共有书目146条，可是用“篇”作计量单位的只有5条，用“卷”作计量单位的则多达141条，几乎占97%。黄强祺对《汉志》所用的“篇”和“卷”亦进行了统计，对“篇”与“卷”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最后得出结论：“一、篇和卷同；二、篇小于卷；三、篇大于卷。”^[27]无论“篇”与“卷”同或异，在《汉志》中它们是各占重要的分量，同时并行的。

3.4 附注项的著录

凡是对于书名项、著者项、版本项、稽核项的补充、说明以及书内的附录、合刊、丛书子目等等，作为正文著录的附注反映出来称为附注项。^[28]古籍整理中的附注项，早在《汉志》中就已出现。班氏沿《七略》而成《汉志》，但有所创新，而书中的附注项则是其创新之一。《汉志》共著录“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其中有附注项的则多达218条。这些附注主要是对所著录典籍的书名、著者、内容、流传等情况进行说明，如：“《王孙子》一篇。一曰《巧心》”，这是对于同部书存有其他书名进行说明。《汉志》附注中对于著者的说明是最多的，有介绍著者名号的，也有说明著者师承关系的，还有简介著者时代及事迹或官职情况的等等，现略举几例：《杨氏》二篇，名何，字叔元，谿川人；《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孙，为鲁缪公师；《李克》七篇，子夏弟子，为魏文侯相等等。对于一书中有无图表的著录，在《汉志》附注项中亦有说明，如：《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

《王孙》十六篇，图五卷等。《汉志》附注中还不乏对书的内容进行说明，如《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说《易》阴阳；《明堂阴阳》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遗事；《周书》七十一篇，周史记；《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迄春秋时诸侯大夫等等。

这些附注，虽是班氏利用刘氏成果，摘其相关内容，在必要处进行的内容说明，但是对后世的典籍整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5 书目著录模式

仅就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著作《汉志》来看，先秦两汉时期的书目著录格式并没有统一的模式。

据《汉志》统计分析，先秦两汉时期书目著录的模式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书名、篇卷数、著者。如：《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

二、著者、书名、篇卷数。如：刘向《五行传记》十一卷；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杜林《苍颉训纂》一篇。

三、书名、篇数、附注。如：《易传周氏》二篇，字五孙也；《周书》七十一篇，周史记；《雅琴赵氏》七篇，名定，勃海人，宣帝时丞相魏相所奏。

四、书名、篇卷数。如：《毛诗》二十九卷；《手搏》六篇；《泰壹杂子星》二十八卷等等，《汉志》中的“数术略”和“方技略”多是这种著录方式。

总而言之，汉代虽然产生了最早的目录学专著，对后世的目录学、文献学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其在典籍整理中，自始至终贯彻着维护统治思想这一宗旨，使得其类目的排列、典籍的分类都是围绕这一宗旨来展开的，而对于典籍整理模式的统一性却并没有很重视，因此在《汉志》中突显的典籍整理方法上所具有的非统一性，则是汉代典籍整理的最大特点。

参考文献：

- [1]班固.汉书·艺文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1701.
- [2]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M].清浙江书局刻本.2.
- [3]班固.汉书·艺文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1701.
- [4][5]班固.汉书·儒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3620.
- [6]班固.汉书·艺文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1704.
- [7]马宗霍.中国经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56.
- [8]杨权.白虎通义是不是章句[J].学术研究,2002,(9):104.
- [9]王国强.汉代文献注释的背景和体式[J].图书馆理

论与实践,2006(5):125.

- [10]班固.汉书·艺文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1715.
- [11][13]许慎.说文解字附检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53.
- [12]许慎.说文解字附检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310.
- [14]孙诒让.墨子闲诂[M].北京:中华书局,1986:302.
- [15]班固.汉书·艺文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1704.
- [16]沈钦韩.汉书疏证[M].清光绪二十六年.浙江官书局刻本:15.
- [17]范晔.后汉书·桓谭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955.
- [18]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M].清光绪十三年.广雅书局刻本:3-4.
- [19]王国维.观堂集林别集·书毛诗诂训传后[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762.
- [20]何休解诂,陆德明音义.春秋公羊传卷10[M].清光

绪刻本:1.

- [21]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M].清光绪十三年.广雅书局刻本:4.
- [22]王弼注.宋本周易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8:644.
- [23]班固.汉书·艺文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1701.
- [24]班固.汉书·艺文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1728-1734.
- [25]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6.
- [26]余嘉锡.古书通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5-26.
- [27]黄强祺.也谈《汉书·艺文志》中的篇和卷[J].图书馆学刊,1982(4):77.
- [28]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图书馆古籍编目[M].北京:中华书局,1985:72.

作者简介:陈莉(1973-),女,中山大学图书馆馆员,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上接第122页)史资源的关键步骤,但最终目的还是希望口述历史资源能被充分利用。采访到的口述历史资源与其它文献信息资源一样需要进行专业的整理,包括对音响资料的转换,对采访时间、采访地点、被采访人、被采访人的信息收索、访问次数等信息的著录,对内容的标引,甚至还包括对采访中所涉及的人物、事件、地点的索引等。^[17]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步骤,可以为后来进一步的利用打下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馆员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将保存在传统录音和录影带上的资料转录,以影音文件的格式转存于计算机上。并可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将分散于各处的口述历史资源数字整理以后,进行分门别类的组合,最终整合成一个远程搜索的网上数据库,并配以文字、照片、图片、短片等其他资料进行补充,从而形成一个丰富的口述历史资源数据库,可以很便捷的实现校内及校际之间的资源互搜、共享。在访问权限的设置上,为了防止利用失控,可以根据需要设置用户的使用权限,资源的开放级别。为了尽可能尊重受访者的意愿,甚至可以采取将口述历史资源截取片段放于网上供读者浏览,对于那些感兴趣的或确实属于研究需要,需获取完整资料的可允许其亲自到图书馆进行查询、阅览。这一做法在国外许多高

校图书馆已开始实行。我国的高校图书馆应该将其提到议事日程中来,坚持以高校图书馆为口述历史资源开发的坚实阵地,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并将之作为高校图书馆一项重要的文献资源开发项目长期坚持不懈的做下去,并最终达到口述历史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

参考文献:

- [1]金文坚.口述历史在地方文献工作中的意义及实践[J].图书馆论坛,2006(8).
- [2][3][14]Hoopes James. Oral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for Students[M]. U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9:5-9.
- [4][5][7][9][10][11]王天红.口述历史:国家图书馆关注的新领域[J].图书与情报.2006(5).
- [6]刘晓莉.图书馆开展口述历史工作的意义及其方法[J].图书馆论坛.2005(8):59.
- [8][15][17]陈俊华.图书馆开发口述历史资源探索[J].图书情报工作.2006(6):126.
- [12][13]郑松辉.口述历史及其在现代图书馆资源建设中的作用[J].四川图书馆学报,2006(1).
- [16]高华.应重视普通人的回忆录[N].北京日报,2005-12-05.

作者简介:乔菊英(1968-),女,华中师范大学2006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